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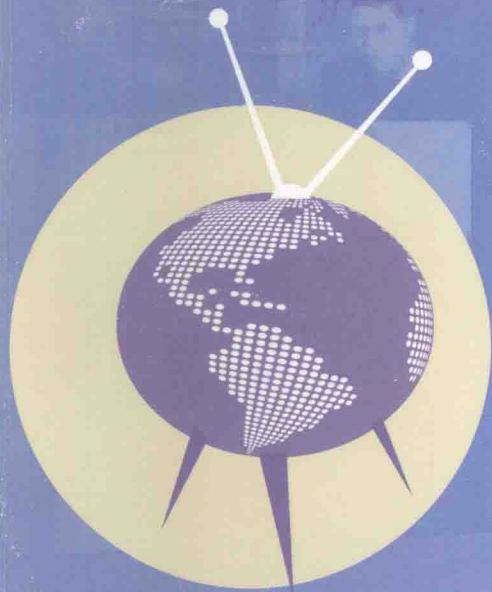
跨文化传播译丛

主编 吴 飞

Barbara J. Selznick

GLOBAL TELEVISION:

CO-PRODUCING CULTURE



全球电视产业

[美] 芭芭拉·J. 塞尔兹尼克 著

范雪竹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传播译丛

Barbara J. Selznick

GLOBAL TELEVISION:

CO-PRODUCING CULTURE

全球电视产业

[美] 芭芭拉·J. 塞尔兹尼克 著
范雪竹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电视产业 / (美) 芭芭拉·J. 塞尔兹尼克著 ;
范雪竹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6
书名原文: Global Television: Co-Producing
Culture
ISBN 978-7-308-16914-1

I.①全… II.①芭… ②范… III.①电视事业—研
究—世界 IV.①G2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2058号

全球电视产业

[美] 芭芭拉·J. 塞尔兹尼克 著 范雪竹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94千

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914-1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全球电视产业

跨文化传播译丛

浙江大学“985”三期创新平台“浙江省一流学科计划——新闻传播学”资助
出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 09ZJD0010）

译丛编委会（以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 吴 飞

编委会成员

韦 路（浙江大学教授）

李红涛（浙江大学副教授）

杨国斌（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

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吴 飞（浙江大学教授）

单 波（武汉大学教授）

姜 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赵晶晶（浙江大学教授）

郭建斌（云南大学教授）

展 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潘忠党（威斯康星大学教授）



启真馆 出品

总 序

1648 年以前的世界，不过是一个个隔离的孤岛，虽然出现过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及中国等四大古代文明体系，但这几大文明基本上只有地域性影响力，全球性秩序还没有成为表征那个时代的重要概念。欧洲 30 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承认国家主权不可随意被剥夺，欧洲文明开始了全球性扩张，主权国家的概念也影响到世界格局的确立，全球性秩序逐渐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近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文明主导着世界秩序。不过海湾战争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结束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这个阶段世界秩序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那就是人权、民主等普世原则等成为超越主权的新的游戏规则，成为美国强势在全球施展影响力的主要工具。当然，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动作多少从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美国近几年单方面行动的作为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尽管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 2014 年 3 月 27 日投票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决议，申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同时敦促各方通过直接政治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但俄罗斯置联合国决议不顾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决议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所不同：前者具有政治影响力，但没有法律约束力；后者具有强制性，相关国家必须接受并履行。

尽管金砖国家在迅速崛起，但当今的世界格局，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美国除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强势影响外，美国还借助其先进的

传播交流技术（尤其是交通与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主宰着全球的经济、消费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美国主导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游戏规则成为这个世界的不二法则。

网络社会的兴起、跨境物质的流动、全球各地区间人类生活方式的互相连接使得“社会”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符号和人都很复杂、易变，产生了一种由“社会化”到“信息”“传播”的转变。^[1]安娜贝拉·斯瑞伯尼（Annabelle Sreberny, 2000）曾指出：“当代修辞学主张，我们生活在一个单一的世界里，在其中，事件与空间均已消亡，距离的体验已不复存在。”^[2]诚然，随着海底电缆、卫星电视、移动电话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国际电信使得时空逐渐消亡，让全世界的人际关系获得自身的即刻性和内在性。全球信息传播重新界定了全球和地方的物理界限，厘定了时间的线性进程，这些都不再虚幻。^[3]

新兴的媒介技术和通信手段，尤其是因特网，让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重构时间与空间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现象。麦克卢汉一样观察到，空间消亡而时间成为关注的焦点是电子时代的决定性结果。但事实上，传播权力并没有因为传媒技术的进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少学者的研究便表明，全球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在线信息往往以欧美国家为中心，国家信息流，仍然是从发达国家流向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生产的文化产品、娱乐产品，仍然主导着全球文化消费市场。但正因为美国的强势地位，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西方是最好的”

[1] Lash, S., Urry J., *Economies of Sign and Space*, London:Sage,1994; Castells, Mann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1996.

[2] Sreberny, Annabelle,“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ition (93-119) . London: Arnold,2000.

[3]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Bass, A.,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J. Derrida.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ix-x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这一观点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更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金砖大国，重新评估自己传统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一股去西方化、“脱美”的风潮正席卷全球，“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与现代”等传统模式无不一再受到更广泛、更严厉的挑战。

与世界权力格局向东转移的同时，重建国际信息新秩序也成为自醒自觉民族和国家的普遍认同。问题是，世界权力的转移是否会导致新的国际冲突？世界和平的理想，是否能够从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文明中获得新的营养？未来的国家实力，如何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找到一种良性的平衡？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真的是世界潜在的规律？

笔者认为，影响世界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利益之争，但与此同时，那种“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之类的二元思考框架，也影响着人们无法超越自我格局的思维定式。这种“你们”与“我们”、“西方”与“东方”的区隔，不仅表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之中，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等方面。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权力危机论”、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到保罗·肯尼迪的“美国的衰落论”，都能够发现“西方”与“非西方”、“我们”与“他们”的实质性区别。诚如保罗·柯文所言：“美国人在处于逆境时，依然可能在感情的最深处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种经过夸大的‘我们’与‘他们’的两分法思想中去，认为‘我们’代表‘文明’，‘他们’则代表文明的对立面。”^[1]这种思维定式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因

[1] [美]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页。

此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式，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1]

历史上从来不乏智者对此进行深入思考。芝加哥大学的谢尔登·波拉克（Sheldon Pollock）教授曾出版过一本专门论述世界主义精神的著作，名叫《世界主义》。在该书中，他专门讨论了印度的世界主义精神，以及这种精神与欧洲历史上出现的世界主义精神之间的差异。与世界主义对等的概念——“天下”，同样见之于中华文明。它的确隐含了“世界主义”的含义。“天下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仍可以看作是古希腊“世界主义”的对应词（杰拉德·德兰迪、郭忠华，2011）。^[2]在西方，随着希腊城邦扩张到波斯，然后又到印度，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思想便自然而然萌生了。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声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第一次清楚地表达出世界主义最初的理念之一就是追求个人自由。而智者学派的安提丰（Antiphon）的雅典思想家就“以毫不含糊的词语断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并谴责贵贱之分和希腊人野蛮人之分”，他的见解“表述了一种坚定的世界主义”。^[3]之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普世观念，反映了人类成员间亲密而安全的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一种个人的自由行为。斯多葛派批评了古希腊人思想中将政治团体局限于城邦的倾向。芝诺（Zeno）认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城市应建立在一个囊括更广泛的人类社会成员的基础之上，他强调政治责任来源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公民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即国家应当

[1] 吴飞：《与他人共在：超越“我们”/“你们”的二元思维》，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0期。

[2] [英]杰拉德·德兰迪、郭忠华：《“世界主义”共同体如何形成——关于重大社会变迁问题的对话》，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

[3] [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是一个世界国家的想法，形成了罗马人和基督教思想的世界普救说的基本观点，给当代社会展现了一种超越我们现在所属社会的人类社会的景象。

1772年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他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一书中，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再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之分，而只有一种人的存在——欧洲人。他们有共同的品位、一样的激情以及相同的生活方式。1784年康德发表了《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宣称历史正在趋向于缔造一个世界主义共和政体的秩序，而这一秩序将取代由民族共和国组成的世界。1795年9月29日71岁的康德写下了著名的《永久和平论》一文^[1]，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法律层面上的世界主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世界主义宪法），开创了世界主义政治哲学，再次将世界主义推到学术前台。不过，尽管世界主义的思想无论在自由主义者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可以找到知音，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却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冷战之后，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移民运动，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公民社会的壮大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世界主义的理念也得到广泛的复兴和发展。人们发现，国家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行动者，尽管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行动者。相反，在处理全球公民社会的事务中，国家已越来越力不从心，各种跨国组织和国际协议（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APEC、G20、奥委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恐怖分子、买卖武器者、洗钱者、贩毒者、拐卖妇女儿童者和知识产权的现代抢夺者都是通过全球网络运作的。与此同

[1]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7—144页。

[2] 参见[英]罗兰·罗伯逊、[英]扬·阿特·肖尔特、王宁等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时，各国政府官员——警方调查员、金融监管者，甚至法官和立法者——越来越在全球范围的网络上交换信息和协调行动以打击全球犯罪，解决共同的难题。^[1] 尽管正在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是否能组成一个世界之城仍不确定，但它的确为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

当然“世界主义”不过是众多关于国际新秩序思考的一种向度，其他诸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文明冲突论、天下体系、依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软实力论等，都各领风骚，在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近几年中国一直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内容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这种新秩序的建立，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总之，进入 21 世纪以来，地球虽然还是那个世界地球，但全球秩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新媒体技术、软实力、符号资本等成为传播学研究者最为关切的核心概念。而随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巨大发展，GDP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得异常强烈，中国领导人顺势提出了中国梦旗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重构自己大国形象并谋求在世界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因此重构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国家形象就变成当下最热闹的研究课题。但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如何清晰地表达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同时又如何向国人说明“中国梦”以求形成整合

[1] [美]斯劳特：《世界新秩序》，任晓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力量，仍然是相当复杂而艰难的工作。

为此，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这些著作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全球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中国学界、政界，甚至是商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丛书的译者，大多有较长时间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学习经历，数位译者在海外工作，这确保了翻译的质量有一定的保证。浙江大学出版社有一支优秀的出版编辑队伍，他们辛苦的劳动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特此致谢！

吴 飞

2014年3月28日

献给桑福德、莉莉和埃利斯
我爱你们

在研究本书内容期间，我花了大量时间来阅读和学习。本项目得益于诸多学者、朋友和家庭成员的建议、想法和支持。此外，还有很多人影响了本研究，丰富了内容。在学术上，我必须对艾米·比尔（Amy Beer）深表谢意，她非常关注我对于联合制作的研究。正是她意识到了国际联合制作的重要之处，她的影响贯穿全书。其他人（利用或者没利用他们的知识）给我提供了帮助和鼓励，包括我在亚利桑那州大学媒体艺术学院的同事们，以及其他无私的学者和朋友们：蒂姆·安德森（Tim Anderson）、卡拉·贝里（Karla Berry）、卡伦·戴明（Caren Deming）、塔玛拉·法利科夫（Tamara Falicov）、卡拉·富勒（Karla Fuller）、芭芭拉·戈夫曼（Barbara Goffman）、蒂姆·黑文斯（Tim Havens）、玛丽·贝丝·哈拉洛维奇（Mary Beth Haralovich）、尼科尔·克尔斯曼（Nicole Koschmann）、詹尼弗·詹金斯（Jennifer Jenkins）、朱莉·林德斯特伦（Julie Lindstrom）、Yuri Makino、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杰弗里·米勒（Jeffrey Miller）、迈克尔·马尔卡西（Michael Mulcahy）、戴比·尼夫斯（Debbie Neves）、里奇·尼夫斯（Rich Neves）、霍默·佩蒂（Homer Pettey）、帕特·弗伦（Pat Phalen）、帕特里克·罗迪（Patrick Roddy）、多特·罗姆（Dot Roome）、贾德·鲁吉尔（Judd Ruggill）、凯文·桑德勒（Kevin Sandler）、朱莉·山多尔（Julie Sandor）、贝弗利·塞金杰（Beverly Seckinger）、丽萨尼·斯凯勒（Lisanne Skyler）、贝雷塔·史密斯-尚马德（Beretta Smith-Shomade）、丹·施特赖布尔（Dan Streible）、阿

尔·图奇 (Al Tucci)、维基·韦斯托弗 (Vicky Westover)、米米·怀特 (Mimi White) 和贾斯汀·怀亚特 (Justin Wyatt)。

x 媒体艺术学院的工作人员始终支持着我，提供洞见。多亏吉尔·比恩 (Jill Bean)、托尼·多拉姆 (Toni Dorame)、苏·基斯 (Sue Keeth)、西尔维娅·迈尔斯 (Sylvia Miles)、克里斯蒂娜·斯旺森 (Christina Swanson) 和帕特·瓦尼 (Pat Varney)，让我的生活更加简单有序。我的学生们亦给我很大启发。在几乎十年的时间中，我院学生在本科入学时、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课程中，用积极分析的眼光收看《高地人》(*Highlander: The Series*) 电视剧，且没有(太多)怨言。参与过我课程的学生们也贡献颇多。我也有机会能与非常优秀的研究生们一起共事，他们都值得我特别感谢：艾丽西亚·巴伦 (Alicia Barron)、凯瑟琳·伯杰龙 (Kathryn Bergeron)、雷切尔·博伊斯 (Rachel Boyes)、基娅拉·费拉里 (Chiara Ferrari)、戴比·哈拉米约 (Debbie Jaramillo)、莱斯利·马太 (Leslie Matthai)、卢卡斯·米丘马蒂斯 (Lucas Micromatis)、德隆·奥维派克 (Deron Overpeck) 和萨拉·萨尔文 (Sarah Salwin)，他们在整个研究中的优秀表现，让我受益良多。

丹尼尔·伯纳第 (Daniel Bernardi) 极富洞察力的建议以及他对我研究的信任，对我来说极其珍贵，助力我投入并完成了此项研究。我真心感谢他的支持和友情。在整个过程中，天普大学出版社的弥迦·克莱特 (Micah Kleit) 也乐于伸出援手。在此，我要感谢弥迦·克莱特和天普大学出版社其他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帮助。

本书亦得到了亚利桑那大学媒体艺术学院和艺术与国际事务学院的支持。本书的部分出现在“Europudding :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s and Televisual Representation,” *Spectator* (USC), 20 (Spring/Summer 2000) : 53–62 ; “World Class Budgets and Big-Name Casts : The Minise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s,” *Contracting Out Hollywood: Runaway Productions and Foreign Locations*, edited by

Greg Elmer and Mike Gasher, 157-176, Lanham, MD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 and “The Complete Story : Religion and Race in Global Non-Fiction Programming,” *Global Media Journal*, 6 (Fall 2007), <http://lass.calumet.purdue.edu/cca/gmj/fa07/gmj-fa07-selznick.htm>.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埃琳·菲泽（Elyn Frieser）和马克·菲泽（Mark Frieser）、凯瑟琳·托马斯（Kathryn Thomas）和史蒂文·威林斯基（Steven Wilinsky）以及埃利奥特·威林斯基（Elliot Wilinsky）、亚当·威林斯基（Adam Wilinsky）、丽贝卡·威林斯基（Rebekah Wilinsky）和艾萨克·威林斯基（Isaac Wilinsky），他们在我潜心写作时非常耐心，在我遇到困难时格外热心。像往常一样，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贝特·威林斯基（Bett Wilinsky）和艾伦·威林斯基（Allen Wilinsky），他们给我的鼓励关爱，远远超过我的预期。他们对我的信任，赋予了我力量。桑福德·塞尔兹尼克（Sanford Selznick）给我的，则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姓氏那么简单。他激励我，哄我开心，xi代替我完成很多本该属于我的工作。他的微笑和温柔的心可以点亮整个房间。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孩子们，莉莉（Lily）和埃利斯（Ellis），他们身上汇集了他们父亲的所有优秀品质。他们对生活充满快乐的激情、坚定的决心以及取之不尽的爱与欢笑，给了我很多启迪。为了说明每天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东西，我将这本书献给桑福德、莉莉和埃利斯。

目 录

致 谢.....	xvii
----------	------

引 言：地球村里的“麦电视”	1
----------------------	---

“最有效的反应策略”——国际联合制作的历史	7
-----------------------------	---

“完全真实”——国际联合制作的优点	17
-------------------------	----

“全球文化霸权”——国际联合制作的缺点	21
---------------------------	----

“利用复杂的诡计遍布全球”——国际联合制作的内容与文化	26
-----------------------------------	----

第一章 无国界历史：全球虚构.....	30
---------------------	----

全球爱历史.....	31
------------	----

英语：主导语言	34
---------------	----

全球观众的意识形态.....	38
----------------	----

穿越空间与地点的冒险.....	42
-----------------	----

谁想长生不老：《高地人》.....	53
-------------------	----

第二章 清晰、有力的品牌形象：作为营销工具的英国电视	71
----------------------------------	----

品牌化.....	72
----------	----

英国的国家品牌.....	76
--------------	----